

论北宋前期的时代命题与史学贡献

李峰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北宋前期,为维护皇朝的稳定与发展,学者们借鉴历史经验努力确立和完善国家统治秩序,利用传统正统史观竭力塑造北宋皇朝的正统形象,开展大规模历史编纂活动以重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彰显了史学对现实存在的回应、影响和干预作用。

关键词:北宋前期;时代命题;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5-0136-07

与历史上其他皇朝一样,北宋立国后,作为新兴统治者,也面临着维护皇朝的稳定与发展的时代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可谓殚精竭虑,他们从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出发,根据自己对时代命题的理解,纷纷献计献策。由于史学与现实关系密切,或者说史学正是通过干预现实而彰显其存在的,故而史学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中显得非常活跃。学者们通过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完善国家统治秩序;通过利用传统正统史观,竭力塑造北宋皇朝的正统形象;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历史编纂活动,意欲重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史学对现实存在的回应、影响和干预作用。

一 推崇王道,取法汉唐

检讨历史可以发现,由于历史知识中蕴含着丰富的可资鉴诫的治国经验,因此以史为鉴的思想自先秦时期起就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历史发展到北宋前期,由于新兴皇朝乃继乱世而兴,统治者极度缺乏治国经验,因此充满治国成败、得失经验与教训的古代历史,自然便进入了宋代君臣的视野之中,于是传统的以史为鉴思想再度勃兴。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即颇为困惑地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

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答称:“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1]2}显然,太祖君臣间探讨的虽是一个具体问题,却是一个典型的以史为鉴的例子。宋太宗赵光义也曾多次表达以史为鉴的想法,如太平兴国七年(982)称:“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528}淳化二年(991)称:“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2]713}淳化四年(993)称:“朕历览前书,必深味其理。”^{[2]757}淳化五年(994)临幸国子监,正值令直讲孙奭“讲《尚书·说命》三篇,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宋太宗说:“诚哉是言也。”^{[2]801}宋真宗赵恒也非常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景德四年(1007),他在谈及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即《册府元龟》)一事时曾说:“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阅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诫。”^{[3]556}

北宋前期诸位君主的史鉴思想在臣下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应和。如王禹偁认为以史为鉴,自古有之,所谓“臣闻前事者,后事之元龟也。是以读二帝之《典》,则首曰‘稽古帝尧’,又曰‘稽古帝舜’”,以尧舜之圣尚且要学习古道,更何况是“居三代之末,乘百王

收稿日期:2012-12-16

作者简介:李峰(1973—),男,河南社旗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研究。

之弊”的宋朝,更应该以史为鉴,并且认为如果真正能作到“引古以证今”,就一定会起到“朝行而暮复”的效果^{[4]卷十九《三谏书序》}。陈彭年指出,如果“理有未安”则“事当复古”^{[2]1436}。杨亿认为,“稽古”可以“助论思”,士大夫应该“强学多闻,稽古博识,究历代之损益,明当今之利病”^{[5]357,499}。

在提倡以史为鉴的同时,思想界也继承了传统的历史循环退化史观,视二帝三代为太平盛世,而宋朝是“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的新兴皇朝^{[4]卷十九《三谏书序》},但新兴的统治者并没有因此气绥,而是踌躇满志地将二帝三王之治作为皇朝追求的目标,意欲度越汉唐,比肩尧舜汤武。如端拱元年(988)正月,太宗对赵普说:“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卿其念哉!”^{[2]647}晚年又对待臣称:“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于前代矣。”^{[2]824}

为达到这一目的,学者们纷纷主张效法古圣先王,实行王道,也就是所谓的“皇王之道”或“尧舜之道”。如柳开认为皇王之道是世间最伟大的治道:“皇王之道,混成如天,色笼四周,俾莫能越。”^{[6]卷八《上郭太傅书》}田锡代真宗所做的《制策》称:“朕永惟皇王之理,思复三代之迹。”^{[7]487}咸平四年(1001)六月,田锡奏称希望真宗以“皇王之道”治理天下,表示愿留在朝廷,“常以皇王之道致主于尧、舜”,认为真宗“若师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十年之内,必致太平”^{[2]1065-1066}。王禹偁称当时有儒生名郝太冲者,“凡议一事吐一辞,未始不以皇王帝霸之道为己任”^{[8]卷十三《送进士郝太冲序》}。陈彭年认为朝廷治国应该“宪章三代,取则六经”^{[2]1436}。

从学者们高扬王道的旗帜追踪三代看,秦汉以下的历史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学者们声称要实行所谓的“王道”,但对“王道”的理解却相当粗浅。如在赵普看来,王道就是清静无为。太宗雍熙北伐失利后,赵普表称太宗登极十年之成就:“坐隆大业,无一物之失所,见万国之感康。所宜端拱穆清,畜神和志,以无为无事,保卜世卜年,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塞,与戎人较其胜负。”^{[2]617}在张齐贤看来,王道就是安利百姓,他称:“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2]485}在王禹偁看来,王道就是推行教化、建立尊卑等级秩序,他称孔子“行教化,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述皇王帝霸之基”^{[4]卷二《仲尼为素王赋》}。

在张知白看来,王道就是戒谨,景德年间他称:“皇王之道在乎戒谨”^{[2]1405}。

对于一个继乱世而兴、极度缺乏治国经验的皇朝而言,如此粗浅、抽象的观念显然无法满足其需要,因此学者虽倡言二帝三王之道,但却无法排斥秦汉以下内容丰富的史事。如太宗初年,梁颙上疏称:“臣历观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圣间出,人文阐耀。”^{[9]9863}淳化四年(993),梁鼎上疏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尧、舜所以得贤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两汉以还,沿革可见。至于唐室,此道尤精。”^{[2]760}咸平元年(998),王禹偁代宰臣所做的谢表称:“列国两汉之事,可鉴兴亡。”^{[4]卷二十一《为宰臣谢新雕三史表》}咸平二年(999),朱台符上疏称:“陛下自视当今事势,何如汉、唐盛时?有土者不可言贫,有人者不可言弱,以陛下神圣聪明,资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于汉、唐,窃为陛下惜之。”^{[2]940}真宗也认为自秦汉以下,“有唐文物最盛”^{[2]1799}。

因此,当时的思想界在以史为鉴方面只能走折衷路线,即以效法所谓“皇王之道”之名而行鉴观汉唐史事之实。如宋真宗认为皇王之道属于抽象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只要所做的事情符合社会的发展,就比较接近皇王之道了,他说:“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10]265}据此可知,只要有利于治道,不论是什么时代的典故,对真宗而言都是可以借鉴的。因此,田锡杂取经史子集之事以进呈真宗的想法就得到了真宗的认可。咸平二年(999)五月,田锡奏进的《进撰述文字草本》,记述了与真宗的两次对话:“(五月八日)臣又奏:‘今陛下以何道理天下?愿以皇王之道为理。’臣又奏:‘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共三百六十卷,取日览一卷,可周岁读遍。然不如节略经史子集,作三百六十卷,或万几之暇,日览一卷,所贵理乱兴亡之事,常在目前也。臣欲撰进。’至明日,又再承召对,宣谕:‘所言皇王为理之道,可款曲著撰进来。’臣遂略言《尚书·尧舜典》是帝道,其注亦甚分明。陛下称:‘朕亦常看《尚书》,其注颇甚易晓。’”^{[7]533}据范仲淹说田锡与真宗论皇王之事:“一日,召对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为心,臣请采经史中切于治体者上资圣览。’帝深然之。乃具草以进。手诏答曰:‘卿能演清静之风,述理乱兴亡之本,备观鉴戒,朕心涣然。’”^{[1]319}

在此思想指导下,北宋前期统治者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全面借鉴与效法前代的政治运动。夏竦曾将此总结为:“国家鉴三代典章,采汉唐故事,文质

彬彬,不远中道。”^{[12]162} 由于北宋与唐朝距离较近,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又视唐为一大盛世,并且唐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因而北宋前期对唐代史事的借鉴尤显突出。如就法律制度而言,“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9]4962};就财政制度而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9]4347}。张方平更称:“唐代有天下三百年,其间治乱得失详矣,朝廷立国之纪,典刑制度因于唐者也。”^{[13]245} 总之,北宋前期的统治者通过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与效法,使国家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并日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统治体系。

二 对宋朝正统性的诉求

如所周知,为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合法地位,自三代起,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将自己的统治与上天联系起来,通过声称获得天命,以昭示自己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至战国秦汉间,又形成了以五德、三统为重要内容的正统史观。

所谓五德,即五德终始说。战国时期,邹衍把阴阳五行引入历史领域,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帝王的产生和朝代的更迭,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五行亦即五德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以相克的形式,循环不息。按这种说法,只要新兴的王朝获得了五德之一,也就意味着它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所谓三统,是指西汉中期,董仲舒摭取春秋公羊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的君权天授的三统说,认为王朝的更迭是黑统、白统、赤统等三统的循环。西汉晚期,刘歆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进行改造,以五行相生来解说历代王朝的更替,创立新五德终始说。由于这种新说与儒家的禅让观相契合,比较有利于文饰新兴政权,因此此说出现之后,便与董仲舒的三统说结合在一起,构成正统史观的主要内容,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奉沿袭。北宋建立后,统治者袭前代之故智,也利用正统史观来文饰自己的统治。

1. 称说运命,定宋为火德

由于历代统治者在皇朝新造之际,为“证明自己的政权为正统所系”,大都称说运命、推演五德^[14]。因此,宋太祖在其登极的次日,即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便在大赦诏书中反复称说运命,所谓:“朕以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睠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起自侧微,备尝艰险。当周邦草昧,从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与能。属以敌国侵疆,边民罹苦,朕长驱禁旅,往

靖边尘。鼓旗才出于国门,将校共推于天命。迫回京阙,欣戴眇躬,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旷时。勉徇群心,以登大宝”云云^{[15]19}。与此同时,又颁《即位谕郡国诏》,声称“帝王之兴,历数先定”,“辅臣共述于讴谣,少主自知于运命”^{[3]682}。继而在建隆元年三月定宋为火德,使自己成为正统序列中的最新成员,所谓:“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戊,从之。”^{[2]10} 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国子博士聂崇义认为宋朝“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应该按照传统“奉赤帝为感生帝”,宋太祖将此事“下尚书省集议,如崇义奏”,为坛以祭^{[2]113}。如此,完成了国家德运体系的确立^[16]。

2. 制造符瑞之事,作为兴起之兆

由于正统史观认为正统王朝的兴起必有征兆,如邹衍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17]1277};董仲舒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18]358}。“祥”,就是吉凶的预兆,杜预所谓“吉凶之先见者”^{[19]1808}。故秦汉以后,统治者为显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与皇朝兴起有关的征兆便史不绝书。因此,宋得国后,也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首先,统治者大肆鼓吹讖言。《佛祖统纪》引赵普《皇朝飞龙记》云:“先是,民间有得梁志公铜牌记云:‘有一真人起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保永年。’……及上受禅,而宣祖之讳正当之。”^{[20]719} 释惠演在乾德元年(963)五月所作的《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称:太祖讲周世宗显德年间坏佛像之际,“于莲花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无乃前定之数乎”,所以自己的“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帝之基业”^{[21]卷一百二十三《正定府龙兴寺铸铜像记》}。陶穀称:“周季年东汉国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来一夜春。’后大宋受命。”^{[22]卷上} 薛居正等所撰的《旧五代史》,叙及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以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一事时称:周世宗北征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点检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做’之言乃神符也”^{[23]1583}。赵匡胤在后周曾为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在唐为宋州,故赵匡胤取代后周后,以“宋”为国号。据杨亿称此事早有征兆,所谓:“晋开运间,宋城有异僧状如豪侠,挟铜弹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当有帝王由此建号。’”^{[20]719} 杨亿又称:“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

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后太祖受命，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岂非威灵将及，而符讖先著也？”^{[24]116}钟渊映称：“宋小说载宋乾德初元，丹阳人掘地获古铜钱，文曰：‘大宋乾德通宝’，识者知为辅公祐所铸。”^{[25]卷上}辅公祐为隋末唐初江淮地区的割据势力，据万斯同考证，其国号为“宋”，年号为“天明”，天明二年三月亡^{[26]卷六}。钟渊映又称：“今考诸史，公祐号天明，非乾德也。”^{[25]卷上}显见此二说皆属伪造。大中祥符五年(1012)，舒州获一瑞石，文曰“志公记”，该石文字显示赵宋得国事属前定。所谓：“舒州民有献瑞石志公记，其文曰：‘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赵号太平，二十一帝王，国家启运，在五代后。’太宗丙子岁即位，四五百年之前，天命在国家久矣。”^{[15]26}

其次，造作宋太祖的神异之事。据称太祖之生，颇有符应。如王禹偁言后唐明宗：“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27]637}而赵匡胤就生在后唐明宗统治的天成二年(927)。据杨亿称其生之夕：“光照一室，胞衣如菡萏，营前三日香，至今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28]1}成人后又多奇事。如据杨亿称：陈桥兵变发生时，赵匡胤母太夫人杜氏与其妻王夫人“方设斋于定力寺为祈福，闻变，王夫人惧，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多奇异，人言当极贵，何忧也’”；杨亿还举了数个赵匡胤的奇事，如他称赵匡胤未仕时，过涇州长寿镇寺，“沙门知非凡人”，阴使人图其容于寺壁；在洛阳曾去长寿寺，枕殿砥昼寝时，有道人“见赤蛇出入”其鼻，后见柴太尉亦即后来的周世宗，“太尉奇之，遂留幕府”^{[20]719}。当时赵匡胤还亲自参与到神化自己的活动之中。据说后汉时，赵匡胤投奔随州刺史董宗本期间，董宗本之子董遵海曾问赵匡胤：“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余丈，俄化为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后因与董遵海产生矛盾，“乃辞宗本去，自是，遵海亦不复见紫云矣”；赵匡胤即位后，便殿召见董遵海，谕之曰：“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董遵海再拜高呼万岁^{[2]203-204}。赵匡胤还吹嘘自己“方面大耳”，有异相，为天命所眷顾，周世宗难以加害。所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也？”^{[29]4-5}

另外，统治者还宣扬祥瑞。据称，显德七年(960)

正月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2]1}。

3. 制造祥瑞，以证明北宋皇朝确实以火德兴

对于已经确立统治地位的皇朝而言，祥瑞频现，意味着上天对其正统地位的肯定。《白虎通·封禅》所谓：“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30]283}故历代统治者大都热衷于用符瑞来维护其统治，北宋皇朝亦如此。如建隆元年(960)秋，“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皇宋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龙，槃一盖。其龙形腾上，而尾少左向，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岂偶然哉。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则系之”^{[31]214}。建隆二年(961)，“陇州防御使杨勋献黄鸚鵡，知郢州姚光辅献白兔及驯象，故以为三旗”。乾德六年(968)三月，“驯象至京师，宰相率文武百僚称贺。自后凡符瑞内外奏至，必宣示。宰相即时奏贺，大瑞率群臣诣阁门拜表。是年，太祖亲郊，有司请以国初以来祥异著之旗章，遂作金鸚鵡、驯象、玉兔三旗”。乾德三年(965)八月辛酉、四年(966)八月己卯、六年(968)正月戊申，开宝二年(969)七月乙亥，“寿星出，见于丙”，当时对于符瑞，“皆如礼部式，备载其事类于国史”^{[32]2065-2068}。至道元年(995)四月，知通利军钱昭序，表献部内赤乌、白兔各一，称：“乌禀阳精，兔昭阴瑞，报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征。念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望宣付史馆。”宋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深有感触地对侍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2]813}

三 以宋朝为核心重构新的历史秩序

北宋前期，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恢复与构建自中唐以来已经坍塌的伦理道德秩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学者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就史学领域而言，学者们通过大规模的历史编纂活动，最终将历史推演为在天命主导、帝王统驭以及礼乐刑罚规范与束缚下不断地兴衰成败以至宋的过程。此即王钦若等所谓“自伏羲氏以木王，终始之传，循环五周。至于皇朝，以炎灵受命，赤精应讖，乘火德而王，混一区夏，宅土中而临万国，得天统之正序矣”^{[33]1}，从而使史学领域内的秩序重建工作得以完成。

1. 以宋朝为核心构建新的统治图谱

为了确立新兴政权的合法地位，北宋建国伊始，学者们即以宋朝为核心着手在文化领域内重构新的

统治图谱。在这方面的最初尝试是太祖时期撰修的纪传体正史《旧五代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由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本就是为皇朝量身定做的。在《史记》中,记载天子事迹的本纪是全书的核心,世家、列传等都围绕本纪展开,生动地体现了尊君抑臣的思想,此亦即学者所谓《史记》“帝王以外的人物,都是以帝王为灵魂、为依归的”^{[34]194}。因此,自班固以后,纪传体史书成为官方正史而代不绝书,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五帝以至于新兴皇朝的秩序井然的帝王正统谱系。宋太祖为了使自己的皇朝成为正史正统谱系中的最新一环,很快便下诏修纂五代史。薛居正等史臣受诏后,将五代君主与臣下的资料分别纳入各朝的纪传之中,同时又设世袭列传、僭伪列传以载其他割据政权史实,设外国列传以叙周边民族,从而确立起了一个以中原政权为正统、以其他政权为僭伪,上承唐代、下启宋朝的五代政治图谱。真宗时又撰成纪传体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凡百二十卷,目录一卷,帝纪六(太祖、太宗各三),志五十五(天文三、地理七、律历三、礼四、五行二、艺文七、乐三、职官九、河渠二、选举三、舆服三、食货六、兵三、刑法二),列传五十九(后妃一、宗室一、臣僚四十八、四夷九),与前史相接。总之,北宋统治者通过不懈努力,在史学领域内构建起了近现代统治图谱,从而使这段历史与前代历史实现了有机衔接。

不过,由于以前的统治谱系是当时各朝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的,故宋朝作为一个新的朝代,在利用前朝文化遗产之时会有不适之处,也正因如此,北宋前期的统治者一直尝试着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通贯的统治谱系。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效法前代所修的两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上面。

太宗时期所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在横的层面上,采《周易系辞》“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之说,共列天、时序、地、皇王等五十五部以类群籍,意欲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因认为天地生成于万物之前、是生成万物的母体,《天部》开篇引“《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所自焉’”^{[35]1},将天地列于诸部之前,继而因帝王至圣至尊、德配天地,在《皇王部》开篇引“《易纬》曰:‘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正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至尊之号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35]652},将“皇王”置于天地之后、其他诸部之前,从而在横的层面上确立起帝王在宇宙间与天地齐辉的至高无上地位;在纵的层面上,自传说中的天皇开始,

按照时代顺序一直叙述到唐哀帝,从而确立起了宋人观念中通贯的正统谱系。

真宗时编纂的类书《册府元龟》,则在重构新的统治谱系方面,比《太平御览》更进一步。首先,采引范围与《太平御览》相比,要求较严。《太平御览》采引的范围,“‘正史’之外,无论经、子、集、实录、起居注、小说、笔记、传记、论说、文集、地志、道释,以及古诗、古赋、铭、箴、杂书,尽都采用,引书近两千多种”^{[36]3};而《册府元龟》则相对谨严,“主要取经、史二部书,而史部又主要采用正史、实录一类的官方文献”^[37]。其次,以帝王为核心专记人事。在横的层面上,共列三十一部,首列帝王,继而序以闰位、僭伪、列国君等。之所以将帝王列在第一,是“因为该书的编纂者与其他正宗史家一样,认为历代帝王,全是受天之命”,“既然帝王是受命于天而来治理百姓,主宰一切,故史书所载,理应以帝王为先”^{[36]73}。然后,根据与帝王关系远近,排列出一个等级鲜明的图谱。在纵的层面上,则从远古一直叙述到五代后周,以宋朝建立结尾,而不是如《太平御览》那样只叙述到唐朝。最后,在等级的划分方面更为细致。《太平御览》以秦、东魏、北周入皇王部,以蜀、吴、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册府元龟》则将秦、东魏与蜀、吴、宋、齐、梁、陈、北齐、后梁列为闰位,十六国以及五代时期的十国列入僭伪部。

2. 将朝代兴亡归结为天命

受传统天命思想影响,学者们将朝代的兴亡归结为天命。《旧五代史》作者在解说五代的分裂现象和各个王朝的兴亡时,“往往从‘天命’或帝王将相的个人品质中去寻找原因”^{[23]《旧五代史出版说明》}。《太平御览》对于历史上记载历代帝王神异事件的史料十分看重,“几乎达到凡有必录的地步”^{[38]359},如关于刘邦的神异事件,书中摘引了《河图》、《龙鱼河图》、《尚书帝命验》、《尚书考灵耀》等十一种著述的资料,可谓纤芥无遗,同时又设休征部、咎征部、神鬼部、妖异部共十七卷以记神异之事。《册府元龟》也充斥着天命意识,尤其在《帝王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充斥了《册府元龟》的《帝王部》,从《总序》到每一个《小序》,几乎个个都贯穿皇权神授这一说教”,对历史上“凡是能够说明天命思想的材料,几乎有言必录”^{[36]74-76}。

3. 重视礼乐刑罚

学者们非常重视礼、乐、刑罚在皇朝统治中的作用。《旧五代史》的编纂者认为制礼作乐的作用在于

“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因而为历代所重视,所谓“历代已来,旧章斯在”^{[23]1923}。《册府元龟》的编纂者论及礼,称:“夫礼者,所以法天地之经,建上下之纪,教训正俗,防邪窒欲,序人伦而制邦治者也。”^{[39]6454}论及乐,称:“盖古之应期运,改正朔,一统类,协群志,未有不正金石之声,定缀兆之容,以象乎功德,以和乎人神者也”,认为乐是“法象之所存,治道之所出,非可以暂废者也”^{[39]6480};论及刑法,称:“夫律令者,国之衡石;刑辟者,人之衔辔。”^{[39]7028}

由于学者们认为礼、乐、刑罚在古代统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重构历史秩序的过程中,利用以类相从、以时代为顺序的叙述模式将自上古以至于五代的礼、乐、刑罚内容进行了系统编排,从而确立起了宋朝观念中的礼、乐、刑罚的历史演进体系。具体而言,《旧五代史》叙述典制的志只有12卷,其中礼志、乐志、刑法志占了5卷。《太平御览》的编者,在《礼仪部》中分设出叙礼、祭礼、郊丘等80个类目,用41卷篇幅编列见于典籍的各种礼仪制度,力求将所有的礼制内容包罗殆尽,用以规范人的行为;在《乐部》,分雅乐、律吕、历代乐等50个类目,共22卷内容;在《刑法部》,分叙刑、律令、科等46个类目,共18

卷内容。《册府元龟·掌礼部》分总序、制礼、仪注、作乐、夷乐、讨论、奏议、谥法、希旨、缪妄等10个类目,共34卷;《刑法部》分总序、定律令、议讞、守法、正直、平允、平反、案鞫、深文、枉滥等10个类目,共11卷。

学者论及北宋前期的史学,多不甚重视。如蒙文通认为唐的主流学术是“沿袭六代”,“徒能整齐旧事,无所创明”,将之称为唐的“旧派”学术,认为五代宋初的主流学术仍是这样,所谓“刘昫、薛居正之撰《唐书》、《五代史》,文则四六,诗则西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之集,皆旧派也”^{[40]69-72};吴怀祺也指称北宋前期的史学思想“缺少创新”^{[41]5}。但通过前面分析,我们发现,北宋前期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借鉴前代经验教训,使国家制度得以确立和完善;通过利用正统史观,使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得以解决;通过进行历史编纂,使伦理道德秩序在史学领域内得以确立。故虽学者所言不虚,但北宋前期的史学却对宋朝统治的稳定有着巨大的贡献。并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新兴皇朝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全面继承传统,才有可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与创新,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参考文献:

- [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0.
- [3]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G]//宋集珍本丛刊(1).北京:线装书局,2004.
- [5]杨亿.武夷新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6]柳开.河东先生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7]田锡.咸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8]王禹偁.小畜外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 [9]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王称.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 [11]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12]夏竦.文庄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3]张方平.乐全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J].南京大学学报,2004,(2).
- [15]李攸.宋朝事实[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6]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J].历史研究,1997,(3).
- [17]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M].成都:巴蜀书社,2002.
- [1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9]春秋左传正义[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0]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佛祖统纪[G]//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82).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1]王昶.金石萃编[G].北京:中国书店,1985.

- [22]陶穀.清异录[G]//惜阴轩丛书.长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
- [23]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4]杨亿(口述).杨文公谈苑[M].黄鉴笔录,宋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5]钟渊映.历代建元考[G]//守山阁丛书.上海:鸿文书局,清光绪十五年(1889).
- [26]万斯同.历代纪元汇考[G]//四明丛书.约园刊本,1936.
- [27]王禹偁.五代史阙文[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8]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9]司马光.涑水记闻[M].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0]陈立.白虎通疏证[G].吴则虞点校//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1]袁褰.枫窗小牋[G].俞钢,王彩燕整理//全宋笔记:第四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3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3]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一)[G].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34]包遵信.跬步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35]李昉,等.太平御览(一)[M].夏剑钦,王巽斋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6]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 [37]王德保.《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J].南昌大学学报,2000,(3).
- [38]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 [3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七)[G].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40]蒙文通.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1]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2.

On the Era Propositions of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iography

LI 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ulers had taken a lot of ways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the country, for example, learning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ul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rthodox view of history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orthodox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carrying out the historiography activities to reconstruct a new ethical system. All this reflect the response, influence and intervention of historiography to reality.

Key words: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era propositions;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凌兴珍]